

唐代书仪中的丧服衣服图解析

——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例

朱晓宇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丧礼制服图》(法 Pel. chin. 2967 卷)是一件图文并茂的写卷,它对每一种丧服都从名称、式样、质地和尺寸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规定和示意,对丧服衣服做了详细说明,这在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以《丧礼制服图》为解析对象,解读唐代丧礼中的衣服图,并与唐代前后丧服图文记录比照研究,以了解唐代古礼文化特点,并为今后“三礼”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途径。

关键词:唐代;《丧礼制服图》;礼学;“三礼”

中图分类号:K892.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1-0023-05

之所以选择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丧礼制服图》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敦煌文献多属六朝到晚唐五代宋初之作,其文献上溯时代较早,并且绝大多数为手写本,因此抄写的内容很少受到后代改造,更多地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另外,这类文献中涉及的许多内容或引用资料是现存史书中所没有的,对它的研究可以补充现存传世文献史料之缺。书仪,是古时士大夫私家关于书札体式、典礼仪注的著作。书仪或为士大夫私家著述,或为奉诏制撰^[1]。因此,各类书仪不但涉及家族内外、朝廷和官场,更涉及不同社会层面和现象。其中,吉凶书仪关涉古礼,即“三礼”包含的范畴,由于吉凶书仪囊括各代朝廷制礼、世族或世家礼仪,因此被视为书仪中典型的礼书。

一、《丧礼制服图》的概况

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从唐初至五代,吉凶书仪有二十余种,八十余个卷号。这可以反映唐代时期

各个阶层对礼仪的重视。在这些书仪中,相关文字的礼图却几乎不可见,因此,法 Pel. chin. 2967 卷则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它是一例图文并茂的写卷。法 Pel. chin. 2967 卷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定名为《小册子,丧礼书》。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则为其命名为《丧礼制服图》,文章以下部分均采用《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命名方式。

法 Pel. chin. 2967 卷以双页对摺小册子形式出现,前后文均残。今仅存 7 页(以单页计为 12 页),71 行文字,每隔数行有插图一二幅,共附有丧服各部分插图 17 个,这些图文使我们得以对唐宋之际的丧服制服和衣服图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

根据卷首残存 5 行序文:

误为古今服变广狭制,以致差谬。今见淮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唐礼图》十五卷,其有《丧礼制服度》一卷,精麗不差,轻重合宜,当穷本书理,深得其宜。故持此以匡时要。

由此可知,此卷乃是照抄淮南节度使杜佑《唐

收稿日期:2012-09-01

作者简介:朱晓宇(1987-),女,宁夏石嘴山人,文学硕士研究生。

礼图》中的一卷:《丧礼服制度》。由于这卷丧礼服制度对于丧服服制理解适宜,又能够“精粗不差,轻重合宜”,所以抄录者意在“持此以匡时要”,也解决当时人们现实生活中关于丧服服装规定和形制的疑问及需要。

我们先看一下进上《唐礼图》的杜佑其人。杜佑,出身仕宦家庭,中唐政治家,曾撰成二百卷的巨著《通典》,为典章制度专史开启先河。由此可见,他对礼仪制度是十分重视的,所以由他进上《唐礼图》一说应是可信的。那么杜佑是否为这《唐礼图》的真正作者呢?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时为贞元五年末至贞元十九年之间,那么新进的《唐礼图》一书应该作于此间。但查阅史书却无杜佑制此书的相关记载,因此,进上《唐礼图》者杜佑是否为此书真正作者尚待考证。

为了了解这卷《丧礼服制图》的历史地位,我们可以对历代出现相关丧服服装图的著书进行梳理。五代时,聂崇义根据郑玄等六家之图,参互考订并加以集注,形成《三礼图集注》(二十卷);继聂崇义后,北宋时期陈祥道作《礼书》(一百五十卷);南宋杨复有《仪礼图》(十七卷);有元一代,代表性的礼图又有龚端礼的《五服图解》及俞言的《周礼图》等。可见,在《丧礼服制度》出现后不久,礼图创制已经形成了一定风气,以图释礼已经成为常用的方法。而在此之前,礼图因佚失严重几乎无存。因此,敦煌丧服图的发现填充了五代之服装礼图大多亡佚不可见的空白。

二、《丧礼服制图》的解读

《丧礼服制图》虽为残卷,但是所记录的内容较为完备充实。写卷中丧服衣服图共涉及斩衰用苴麻制成的首经、要经;齐衰大功用杜麻为首经、要经;小功、缌麻等经及斩衰冠、齐衰冠、纓武;妇人用總;衰衣、负、辟领、衰和裳等等。这些衣服部分从首至身体各部位都有所涉及,且多以斩衰、齐衰服为主,兼及大小功和缌麻。以下将选择其中经带、斩衰冠、衰衣、裳等部分进行解读。

(一) 首经、腰经

按《开元礼》云:苴麻“经带”首经大九寸,左本在下,绳纓。十三月小祥,别除之……《仪礼·丧服

传》郑注云,首经象绳(纁)布冠……(图1)



图1 首经

经带,是指丧服所系之带,又分为经与带两种。经带一般用麻制成,捆扎在头部叫做首经,捆扎在腰部则称为腰经。古代有“男子重首,妇人重带”之说,即男子的丧服以首经为最重要;女子则以腰经为最重要。古人常服束腰之带有二:一为革带,以革为之,用以佩鞶褱(形似围裙的皮制蔽膝);一为大带,以丝为之,在革带之外。服丧时,以麻制腰经代大带,而以绞带(麻绳)或布带代革带^[2]。斩衰用苴麻制作首经和腰经,且首经左本在下,齐衰、大功用杜麻。这些文字描述与《礼记·丧服》以及元代《五服图解》基本一致。而配图也和文字描述相当,经带为苴麻制作,且为“绳纓”而非“布纓”。

(二) 斩衰冠

按《开元礼》云,斩衰之冠,正服、义服冠同六升^[3]。右缝,通屈之二条绳为武垂下为纓,所为条属于经上。此处斩衰冠(图2)文字记载同《礼记·丧服》:“斩衰冠六升,绳纓。”《仪礼·丧服》殇大功章记述:“其长殇皆九月,纓经;其中殇七月,不纓经。”^[4]郑玄注曰:“经有纓者,为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经有纓。以一条绳为之。小功已下经无纓也。”贾公彦疏曰:“经之有纓,所以固经。犹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结于颐下也。五服之正,无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殇有之。……郑知一条绳为之者,见斩衰冠绳纓通屈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纓,故知此经之纓亦通屈一条属之经。”而《丧礼服制度》:“通屈之二条绳为武垂下为纓。”此处与郑、贾氏所注以及《开元礼》记载都不相同,且可能是传抄过程中产生了谬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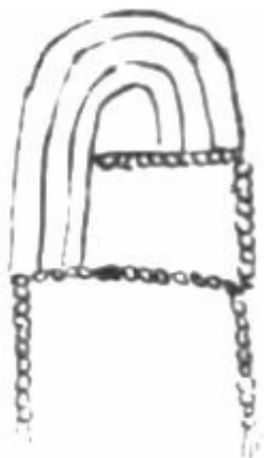


图2 斩衰冠

斩衰冠后,该书还为我们介绍了“總”(图3):“總用妇人,以六升布为總。總用束发,今无此制,今幘头或得其意耳。”这里妇人用的總同斩衰冠一般,所使用布均为六升。但从《丧礼服制图》所示總图来看,“總”仅为布帛聚合成为一圆圈状,做妇女用来束发之用是可想见的,然而虽同幘头功用相似,形制上却相差很大。



图3 總

(三) 衰衣、负

衰衣,按《开元礼》云,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为三衄,衄犹摄也,削犹杀也。若齐衰已下则裳外削融。衰衣即丧服中的衣制。衰衣前当心有“衰”,背后有“负板”(图4)。图4所展示的“衰衣”有别于大部分丧葬礼书、礼图中所见到的衰衣形制,值得注意。贾公彦疏:“云衰外削幅者,谓缝之边幅向外;裳内削幅者,亦谓缝之边幅向内。”王先谦集解引王引之曰:“补削谓弥缝其阙也。削者,缝也。”

负,在背上,谓负板也。广一尺,下至胫,过领一寸。又云辟领一尺六寸,谓辟领一边开四寸,量之有八,别一尺六寸也。从图4可见,《丧礼服制图》中描述的负板上“过领一寸”,“下至胫”,从图4中也可以看到领口上方突出的“负板”部分。这与元代龚端礼《五服图解》中对负板的图示并不相同。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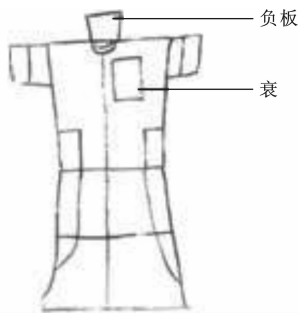


图4 衰衣

氏图中负板介于领下、腰上,居于背部中央,而非《丧礼服制图》中记载和绘图中的显示出来的那样长。另外,据此处描述“广一尺,下至胫,过领一寸”,我们可得知一尺长亦是不可能达到“过领一寸”,“下至胫”的,因此这一处描述还尚存考证。

(四) 裳(裙)

前三幅后四幅,幅为三褊,通以一条绳贯之。裳者,衣下曰裳,今俗谓之裙,若用全而为之,一幅为两幅,前三幅后四幅,则广狭合其制矣。齐衰以下并以为之腰带。这里三幅裳图不尽相同。先看清人江永《乡党图考》中记录的深衣裳孔疏订误图(图5):“孔氏玉藻疏,谓布六幅,交解为十二幅。狭头八寸,宽头一尺四寸,各去边缝一寸、狭头六寸、宽头一尺二寸,缝合之,则十二幅皆成偏邪之形……与经文‘衽当旁’不相应,亦与郑注‘衽谓裳幅所交裂’之解不合。家礼遂承其误,并续衽钩边之制。释者亦失之,今正其误。”这里,按照江永所说的裳制,即前三幅联缀成一片,后四幅并没有联缀成一片,这样穿用起来,下身就有许多缝际,两侧各一,身后有三。而这样的裳还能起蔽体和遮羞的作用吗?所以,江永的结论似有问题。再看《丧礼服制图》(图6)的描述:“前三幅后四幅,幅为三褊,通以一条绳贯之”,但我们在其图6中似乎看不到“前三幅”、“后四幅”,在这里裳反而更似帷裳,即一幅布帛围系在腰身之下。而在龚端礼《五服图解》中,裳制(图7)似乎更贴切文献记载,且每幅中有“三褊”。如果我们把《丧礼服制图》图上方的“裳”理解为“前三幅”,则裳共有九褊,似乎和“幅为三褊”相同,下图可作裳统共有“七幅”之理解。但如此一来,我们看到的裳仍旧是“一块”布帛。那么这前三幅联缀的衣片以及后四幅联缀的衣片,到底是前后两片不缝合,还是连缀成一片围系在腰间的?从前文也可以看到

三、结 语

古代礼学中,最重视的就是丧服制度。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一文中所说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里人们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安于斯、葬于斯。因此,这就说明了家庭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因而,人们最重视丧服也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日本学人副岛一郎在《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一文中提到:“虽说唐初承续着六朝礼学的传统,但它也随即急速地衰废。那么,六朝以来的丧服学如此急剧衰退,其原因何在?我想其原因之一是唐朝制定贞观礼等而改变了古礼,尤其是增改了丧服。”^[6]的确,吴丽娱在其《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一书中也提到,Pei. chin. 2967 卷多处文字有遗落和误写^[7]。这些似乎向我们证实,古代社会的礼仪到了唐时已经衰废,并且与社会生活层面的连接也几近崩裂。

在《丧礼服制图》中,创制者不仅详备文字,并且配图向人们展示当时丧服衣服的式样。可见,唐人仍十分重视古礼在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行中的地位。但从其中的部分草率抄录和绘图有失精准,不难发现,重新修制古礼者在此时虽然一再简化、明晰和普及,甚至使用书仪一类的礼书、礼图做通俗性的宣传,但总体而言,这些古礼和离社会、宗族的联系日益疏离,最终因为时代悬隔、制度难解而被束之高阁。

参考文献:

- [1] 陈 静. 书仪的名与实[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0 (1): 102-106.
- [2] 丁 鼎. 丧服经带规格考略: 兼与彭林先生商榷[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6): 139-140.
- [3] 王文锦. 礼记释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 贾公彦. 仪礼注疏: 卷三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 刘 熙. 释名疏证补[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6] 副岛一郎. 从“礼乐”到“仁义”: 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J]. 学术月刊, 1999 (2): 66-73.
- [7] 吴丽娱. 唐礼摭遗: 中古书仪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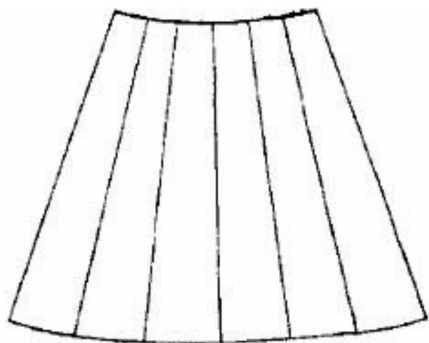


图5 江永《深衣裳孔疏订误图》中的裳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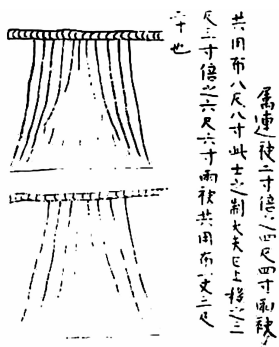


图6 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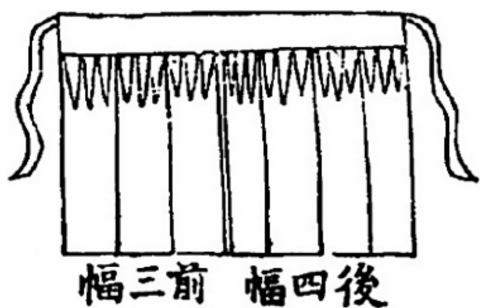


图7 龚端礼《五服图解》中的裳制

《五服图解》和《丧礼服制图》对此亦有不同理解。

由此得知,“裳”虽然可以蔽体,但因为有缝际所以仍有局限性。所以,汉代以后的人们索性把裳的前后两个衣片联缀起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裙”。“裙”是“群”的同源派生词,意思是将多(群)幅布帛联缀到一起。所以,《释名》释“裙”为“联结群幅也”是完全正确的^[5]。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种假设,即唐代丧服中的裳可能已经是七幅连接成一片,正如《丧礼服制图》中所示。但此时,就似乎难以辨别所谓的“前三幅后四幅”了。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丧礼服制图》还提到“裳者,衣下曰裳,今俗谓之裙”,可知在此时“裳”与“裙”已为同类并存。

Analysis of mourning charts in Tang Dynasty —taking Pel. chin. 2967 in Dunhuang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ZHU Xiao-yu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Mourning and Full Dress Charts* (volume Pel. chin. 2967 in France) in Dunhuang western literature is an illustration manuscript. The illustration manuscript described every kind of mourning from the name, style, texture, size and other aspects with detailed rules and sketch. The mourning and full dress were specified in detail, which played a role to popularize the difficult system of mourning apparel plays a role. The article takes “funeral pictures” as analytic objects, interpreting the Tang Dynasty mourning, mourning graphic record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era being. So we can understand the Tang Dynast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new clue and way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Sanli”.

Key words: Tang Dynasty; *Mourning and Full Dress Charts*; ritual study; “Sanli”

(上接第 22 页)

Two recently discovered epitaphs about Daming Palace —concurrently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royal marriage and promotion system of officials in Tang Dynasty

HU Ming-z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wo recently discovered epitaphs about Daming Palace collected in Datang West Market Museum, literature and the royal marriage and promotion system of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 were analyzed.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 the first epitaph, “Epitaph and Forwords of Yong Guan Ying Tian Pan Guan Zuo Xiao Wei Bing Cao Canjun CUI and His Wife ZHAO Jun Lee died in Tang Dynasty”, the Lord CUI Cheng-wu was not appraised by his literati family pride but by his literary level, which was proved by the formation of Yongzhou literatry circle with LIU Zong-yuan, WU Wu-ling. The second epitaph “Epitaph and Forwords of Prince Xi Ma Yang Fujun Lord Baoying County Longxi Lady Died in Tang Dynasty” was for a head of Baoying County. It records TANG Wen-zong's demand on any royal females to select husbands in the eighteen families, “choosing famous families”, in imperial edict. Epitaph also records morning meeting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yea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for kinsman of the emperor in Daming Palace to meet the emperor, and provides material for the emperor's reward of officers (military),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Key words: Daming Palace; rest palace; morning meeting; epitaph